

■对 话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肖克凡：工人题材是我发掘不尽的文学富矿

□本报记者 许 莹



肖克凡

工厂是我的精神故乡

记 者：肖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凭借中篇小说《父亲和雕像》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您长期关注工业题材，《父亲和雕像》延续了您此前细腻深刻的风格。能否请您先和我们分享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父亲”与“雕像”这组核心意象最初是如何进入您的写作视野的？

肖克凡：谢谢！提到《父亲和雕像》这部中篇小说的创作缘起，这引起我的一些思考。上世纪80年代我被称为“工业题材”作家，小说创作以反映工厂和工人生活为主，例如中篇小说《最后一个工人》《最后一座工厂》，还有长篇小说《原址》。近年来我时常忆起当年的工厂生活，内心颇有感慨。青春时期的我在工厂得到成长，是工厂生活滋养了我。一个青年工人在工厂形成自己的“三观”，可以说工厂几乎是我的精神故乡。工业题材是我发掘不尽的文学富矿。如今，我和当年的工人朋友、工厂生活渐行渐远，这反而重新焕发了我的写作激情。我在工业题材的写作过程中，也重新发现了自己。“父亲”与“雕像”进入我的写作视野，全然来自生活的积累。起初标题是《父亲的伽马刀》，编辑说有人就该有雕像，有灵魂的雕像等于活生生的人。我听从了编辑的建议，“父亲和雕像”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写作本身就是将积淀在心灵深处的情感焕发出来，从而生成一系列文学形象。这部小说中的李玉福和李秀柱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工厂的“儿子”，一个是工厂的“孙子”，在小说的“文学时间”里我让这些爷儿俩重逢，完成了两代工人之间的情感羁绊与精神传承。

记 者：《父亲和雕像》以克制的笔触书写代际的沉默与和解，也在个体命运的褶皱里藏着时代变迁的重量。想请您谈谈这部作品的具体创作过程？在人物塑造、叙事节奏、语言打磨等方面，您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

肖克凡：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还是有原型的，而且是诸多人物原型的综合体。我16岁进工厂，接触过很多老工人，也接触过不少青年工人。他们成了我笔下的文学人物。比如认为自己“还是双脚踏在华北电机厂土地上”的电工田铭，前来退体的退休厂党委书记崔凤歧，卖了工厂地皮移居东莞的退休厂长宋桂池，以及杜玉雯、高富英和能言善辩的刘大辩等。他们都来自我多年的工厂生活见闻。

至于小说的叙事节奏，这不是个孤立问题，而是作家经久写作形成的，只是在不同的作品里有所调节而已。叙事节奏的要害是学会控制，写作状态若信马由缰也不都是好事情。小说语言是生活的赋予，而语言打磨是多年写作形成的习惯。初稿完成进行通篇修改的时候，我尽量做到字斟句酌，同时避免刻意的雕琢感，另外，努力保持语言的地域特色，也是我所追求

采访手记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作家肖克凡的《父亲和雕像》获中篇小说奖。小说以华北电机厂为背景，探讨家庭、责任与传承，折射了工业化进程中工厂与一代人的沧桑变化。肖克凡16岁便进入工厂做工，这份贯穿其青春岁月的工厂履历，成为其写作道路上的宝贵财富。采访时他告诉记者，工业是一种文化，工业题材写作正是要将目光对准生活在工

业文化中人的爱恨情仇、矛盾纠葛。当我进一步请他谈谈自己对工业文化的理解时，肖克凡用颇具画面感的语言把我带回到他笔下描写的和他曾经历的工厂生活：工厂下班的人流里，车把上用网兜挂着的饭盒碰撞自行车大梁的“交响乐”是一种工业文化；车间巨大的蒸箱里，工人们为了省下饭费自己带饭把饭盒放进蒸箱，那种混合着各类饭菜、“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味道是一种工业文化；车间总有能耐人，那些会修自行车、会理发的工人总在午休时间无偿地帮助大家，这也是一种工业文化……

勤俭持家、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等抽象的词语，全部融进工人三餐、通勤、午休等日复一日的世俗生活。他笑说：“采访让我想起曾经那些有意思的事情，我的心至今仍久久难以平静……”

的认识。你也不能通过一口锅就掌握它的生产过程，工厂题材很难通过间接经验来完成对它的想象。过去很多作家之所以写工业题材失败了，一些读者不买账，认为是概念化创作、主题先行、文学性不强，是因为作者忘了工业是一种文化，我们表达的是生活在工业文化中的人的爱恨情仇、矛盾纠葛。

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文学理想

记 者：您在文学道路上已深耕多年，从最初提笔写作到如今斩获鲁迅文学奖，您觉得自己的写作发生了哪些重要转变？又有哪些东西是您始终坚守、从未动摇的？在您的写作道路上，有没有哪些关键的人、事或者阅读体验，深刻塑造了您的写作底色？

肖克凡：我的写作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由于早年有过工人和工厂的生活经历，我最初是以工业题材写作为主的，所谓进入人文坛的作品也是工业题材中篇小说《黑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陆续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后来觉得工业题材似乎写尽了，就开始转向。第二阶段是以天津这座城市为背景的地域题材小说创作，例如长篇小说《天津大码头》和中篇小说集《天津少爷》《人间城郭》等等，以文学方式完成“母城书写”。第三阶段就是重新拾起工业题材写作，例如长篇小说《机器》和《生铁开花》，这只是我第三阶段的初期。近年来我意识到工厂和工人生活其实还远远没有得到深入发掘，便确认了对工业题材写作的回归，写作并发表了《洁本工厂情史》《工厂文学简报》《窗外的钥匙》等小说，还有这次获奖的《父亲和雕像》。

我认为，在写作中跟编辑的交流和沟通非常重要。尤其当下年轻的文学编辑居多，我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新鲜的东西。

记 者：《父亲和雕像》最初刊发于《当代》杂志，并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能否请您聊聊这部作品发表前后的相关故事？您如何看待当下纯文学的传播与阅读环境？面对读者的反馈与评价，您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肖克凡：《父亲和雕像》最初刊发于《当代》，并且获得了该刊的年度奖。《小说月报》转载后，还获得了第21届百花文学奖。百花文艺出版社敏锐地意识到这部中篇小说的内涵意义，出版了《父亲和雕像》的精装单行本。这对我是个鼓励，也扩展了这部小说的影响。当下纸质阅读出现很大变化，纯文学期刊和书籍受到挑战和冲击。然而文学作品是人类的精神产品，自然不会消亡，只是传播和阅读方式被改变而已。我从事写作是因为我有想法要表达出来，尽管我的读者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我坚持写作就是了。我最在意的仍然是自己的写作是否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文学理想。

记 者：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是您创作生涯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站在这个节点回望与前瞻，您有哪些感受与写作规划？在当下的时代语境里，您认为写作者应当如何自处，又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命题与读者的期待？

肖克凡：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是我创作生涯的重要事件，对我触动很大。既然受到这样的鞭策和鼓励，我会努力提高文学修养，加强文学定力，以单纯之心面对繁复的生活，从而坚守自己的文学写作原则。面对时代的呼唤，争取做个称职的文学写作者。

此时“站在这个节点回望与前瞻”，我有了新的感悟。四十多年前，我是个爱好文学的业余作者，后来成为发表和出版了数百万字的作家。如今，我是个退休在家的人，没了“专业作家”的名号，再度成为40多年前的“爱好文学的业余作者”。我欣然发现并接受这个新的身份，定将保持当年的热情甚至激情，继续写作下去。



肖克凡部分作品

的。这些人物在我内心酝酿良久，一招一式就写了下来。

写出足以唤醒人们记忆的时代人物

记 者：“父亲”题材天然带着私人经验的底色，读者也常常会在人物身上读到作者的精神投影。能否请您谈谈，您个人的生活经历、与父辈相关的成长记忆，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部作品的建构？您又是如何处理“私人经验”与“文学虚构”的边界，让一个带着个人体温的故事，具备跨越代际的普遍共情力？

肖克凡：一个作家的写作会带有私人经验的底色。我在天津这座城市出生长大，从小跟随外祖母、祖母生活。尽管与父亲共同生活不足两年时光，他却给我留下了为人规矩、处世善良的深刻记忆，对我影响不小。我觉得在文学创作中，所谓“私人经验”与“文学虚构”的边界并不清晰，毕竟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时光的叠加，我们记忆中的“私人经验”可能会演化出虚构成分，姑且称为“时光发酵效应”。尤其小说家的记忆世界里，所谓“私人经历”不断被文学思维所丰富，可能连作家本人都意识不到，但是毕竟在记忆深处发生着。这也就是小说产生的前史吧。

至于一部文学作品能否跨越代际而产生普遍共情力，这需要作者和读者双方达成一致。如果能够达成当然是作家的幸运。我小说中李玉福的种种行为，可能当今青年读者会感觉有点隔膜，这也是时代变迁的必然。今后写作力求能够得到读者更多的共情。

记 者：您的写作始终与工人题材密切相关。这部《父亲和雕像》同样以华北电机厂为背景，将老一代工人、工厂的命运和现实处境融合在一起。能否请您谈谈您的创作观念与文学理想？在您看来，工人题材书写与其他题材书写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肖克凡：我从写作初期接受的文学教育就是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我的小说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文学理想就是力求表达时代生活的变迁，写出足以唤醒人们记忆的时代人物。工业题材的书写与其他题材的书

写相比，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因为文学是人学。工业题材和其他题材都是表现和刻画时代人物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只是目前从事工业题材写作的作者相对比较少，这个创作队伍有待繁荣和壮大。

文学作品可以塑造时代弄潮儿以及风云人物，当然也要表现所谓“过时的人物”。《父亲和雕像》里老一代工人那份融入骨髓的、交织着倔强与失落的复杂心态，足以展现他们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李玉福做不到“以天下为己任”，但是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发自内心的“有所担当”精神，已经说明了其人生价值。他在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面前，起到了镜鉴作用。

记 者：在您看来，目前工业题材写作者相对较少的原因是什么？工业题材的写作难度在哪里？

肖克凡：导致目前工业题材写作者较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对工业有深厚了解的人太少。写作是一个感性活动，你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产生感情。前些日子一个朋友说夏天到了，小区里挖点野菜蒲公英吃，可以清热解暑。我问蒲公英长什么样子。朋友笑说我竟连蒲公英都不认识。我从小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确实不认识蒲公英。这也反证了为什么写工业题材的作者那么少，道理是一样的，不了解何谈认识、何谈情感、何谈感悟？再一个原因是，当前我们国家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传统工业走向高科技制造强国，智能制造、能源转型、大国基建等新领域不断开拓着工业题材写作的边界。对于这些新领域我的了解也不够多，需要更多的年轻力量加以关注。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是很漫长的。如果缺乏对工业的基本认识，只是短期进厂采风、蹲点创作，恐怕很难产生真挚的情感与独到的认识。

工业题材的写作难度也正在于此：写作者要是“道中人”，要有自己的认识和积淀。为什么农村题材比工业题材写作要容易一些？因为对农村题材的认识会有很多间接经验来支撑。比如即便生活在城市，你也能看到与农村近似的小草大树、雨露风霜等自然风光，没进过韭菜地但也可能在菜市场买过韭菜。但是工业题材不一样，工业是人造景观，电机、马达、车床等在生活中并不常见，需要回到工厂中才能对其有更加深刻

《收获》《上海文学》《天涯》《作家》：

“神话”的回响：个体写作中的时代景深

□车信昱

具体可感。汤成难《寻找骑兵团》是将“神话”置换为“童话”。童话的清逸灵动不逊色于神话的铺张奇崛，只是在不同的向度上承担着文学对原始想象力的渴求，为人与人之间澄澈的生命关系塑形。在这些作家笔下，文学线索的神话色彩，并不仅呈现为个体对内心深度的执着，也时刻提示、展望着个体与周遭的关系，使个体的神话性嵌入时代之中。换言之，个体神话不是封闭的、只写内心的，它天然连着外部世界——因为个体的情感和关系，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所以个体的神话性，最终会“嵌入时代之中”。

学者陈思和曾在当代长篇小说中提炼出普遍存在的“历史—家族”叙事模式：“在莫言与张炜的创作里，这种叙事又融入了神话的因素。张炜的《刺猬歌》同样属于‘历史—家族’的大框架，但在后者那里，历史被淡化，而神话被凸显出来，小说大量融入胶东民间的野物传说、精灵故事，历史时间退到背景，神话寓言成为叙事主体。”在与我们更贴近的当下，时代大势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个体提供更完备也更个性化的发展空间，历史裹挟着家族的叙事已经逐渐淡化成背景，但时代

神话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换了形态。如若我们将视野放宽到历史和家族的层面，那么这种神话寓言便不再单单属于个体，而是属于整个时代的“神话”。范迂的长篇小说《乌衣巷》（《收获》2026年第3期）便是向古人或他乡远远借来一个模糊的“神话”，以映衬今日的社会。“乌衣巷”象征着从王谢世家到寻常百姓的视角转换，也正是小说的应有之义。《乌衣巷》写了一个不在中国本土的“唐人街”的故事，围绕阿婵和阿雀两个女性角色的生命经验展开。这与此前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有些相似：在异域的生存故事本身就有着神话色彩，两个故事都借沉淀下来的历史中厚重的神话性，彰显血泪下的美好。但《乌衣巷》不同于《给阿嬷的情书》，其中的人物缺少温情的互助，两位贯穿全篇的女性之间也并未产生真正的生命纠葛。或许正因每个人都走向了偏悲剧性的一面，作者在小说中插入对话文体，借刘禹锡之口来警示自己的写作或许有陷入“俗”的风险。但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份不可脱的“俗”，才避免了文学作品因追求完美圆满而如伊卡洛斯般因飞高而坠落，才展示出一幅“俗世神

话”，真切地映照出时代中的众生相。

神话同样也寄寓于新诗与非虚构作品之中。非虚构与新诗常被看作两种差别极大的文类。但浏览几种刊物，我们会发现其中刊载的诗歌多有叙事性甚至非虚构的底色：张晓雪《爱意深重》组诗（《上海文学》2026年5月刊）对身边人爱恋的书写，曹小航《杯底的倒影》组诗（《上海文学》2026年4月刊）对个体生活的直呈……这些作品都具有一种朴素的生活品格，拒斥着模糊不清的自我形象，并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印证个体。在《电铃声里的时光流转》（《天涯》2026年第3期）一文中，黄灯同样以自己的“成长史”为支柱，回顾个人写作历程，发觉只有在个体的抉择与感受的路途中才能“看见”他人与世界，看清个体与时代的关联。这是一种朴素的、从真实生活里生长出来的超越性，通过个体的真实感受和抉择，抵达他人和时代。

个体与时代的“神话”如何相互联结？除却“俗世神话”外，文学线索如何才能展示出另一种时代大势？韩少功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曾把20世纪的文学勾勒为“自我性”与“人民性”两条

路径，并认为人文主义在当下仍然未曾泯灭：“我们也许可以尝试另一种方式，用一种大口径历史的角度，来重新描述文学史，比方用‘人民性’和‘自我性’这两个路线，大体梳理20世纪的文学遗产，以照顾认知目标、社会背景、资源依托、美学趋向等诸多方面……新世纪的碎片化甚至粉尘化，仍在受到humanism的顽强抵抗……‘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我们不妨继续说下去。”我们理应看到，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发展，人民合力塑造时代大势的具体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文学难以面面俱到地承载个体与时代的关联。但这或许也有利于文字成为更凝练、集中的艺术载体，在简练与抽象中焕发出深意，让个体的心魄容纳起时代神话最本真的模样。这大抵正是个体与时代神话的另一个交汇点。

或许，在这些最质朴、扎实的写作中，“神话”获得了最纯粹的意义：它可以不栖身于文学线索，而是融入个体，使有时代意识的个体能够成为“自我性”和“人民性”之间的枢纽，从一种文学修辞，转变为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生）